

国外专家与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体制的变革^{*}

李永康

[摘要] 改革开放之初, 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改革工作面临着理论匮乏与经验不足的困境, 为此, 中国共产党通过不同渠道、方式有组织地邀请外国专家来华讲学座谈, 系统学习与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来自日本、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与地区的经济专家, 向中国介绍了先进的经济管理经验与方法, 带来了西方现代化的发展策略与战略, 推动中国的经济工作者向现代经济学者转型; 来自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欧改革专家, 为中国改革者提供了改革的新思路、新理念与新理论。他们共同推动着中共对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认识走向深化。

[关键词] 中国; 经济改革; 现代化建设; 外智参与

[中图分类号] K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708(2023)06-0064-15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十分缺乏经验的情况下起步的。因此, 中国共产党在事业启动之初就及时批判了“四人帮”所鼓吹的“洋奴哲学”“爬行主义”, 多次强调要在思想上坚持对外开放, 大胆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 注意学习和利用国外搞经济建设的先进经验。当时, 向国外学习的途径有二: 其一是“走出去”, 即中共领导人在出访西方发达国家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过程中亲历观察与体验, 以及组织大规模代表团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工作进行专门、系统的考察; 其二是“请进来”, 即邀请外国知名的经济专家、学者以及国际性经济组织来华调查、讲学, 并为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提供咨询和建议。二者是中国在思想上坚持对外开放的一体两面, 忽视任何一方面都不足以展示改革开放的完整图景。

以往学界对改革之初中国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研究, 已积累了一定的成果, 丰富了对改革开放的国际背景的认知, 但研究的重点主要放在“走出去”的一面, “请进来”方面的研究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缺乏整体性的考察与分析^①。有鉴于此, 本文拟从管理、现代化、改革和理论四个方面, 对改革开放初期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外智参与活动进行整体把握, 以期对总结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提供一种国际的视野与线索^②。

*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科研基金项目“1978至1982年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中的外智参与”(项目编号581123030921)的阶段性成果。

① 萧冬连:《中国改革初期对国外经验的系统考察和借鉴》,《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4期;文世芳:《1981年杭州世界经济讨论会始末》,《党史博览》2017年第1期;文世芳:《改革开放初期西方经济学引入中国及影响》,《红广角》2017年第3、4期;文世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世界银行对中国的两次考察及影响》,《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3期;文世芳:《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与联合国合作的历史考察——以中国与联合国四个下设组织合作为例》,《上海党史与党建》2018年第6期;毕亚娜、邓美薇:《改革开放初期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的创立及其影响》,《当代中国史研究》2022年第3期等。

② 需要指出的是, 受材料与篇幅所限, 笔者在这里只对一些引起中共高层重视, 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发挥了重要影响, 并能够反映出外智参与的基本趋势、主要特征的邀请活动进行梳理, 并没有囊括所有。

一、介绍企业管理经验

在计划经济时期，企业没有经营管理的自主权，企业领导者经营管理理念落后，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企业设备的生产效率大打折扣，产品的质量也层出不穷。这些问题在1977年开始的大规模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的过程中被进一步暴露出来，一些企业对“引进的生产线，不知道怎么运行管理，但又不能理解和接受人家的配套管理方法，结果很多引进项目效益发挥不出来”^①。而且，在针对经济工作的对外考察中，人们也直观感受到我们与国外管理水平的差距，看到先进的企业管理与现代化之间的密切联系^②。这引起了邓小平的高度重视，他不仅将管理与农业一并视为决定现代化进程的两件大事，还将借鉴、引进国外的先进管理经验，“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③提上了对外开放的正式议程。在这种背景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国一方面派出数个考察团对国外的企业管理进行专门考察，同时也从发达国家连续邀请知名的管理专家来华访问、讲学，为中国的企业管理者带来当时世界上最为前沿、先进的管理知识、信息与理念。（见下表）

1978年至1982年外国企业管理专家访华情况

时间	邀请单位	邀请对象	国别	主要活动与建议
1978年8月8日—9月6日	第一机械部	日本小松制作所质量管理交流团	日本	1.以北京内燃机厂为试点引进质量管理方法 ^④ ；2.在北京内燃机厂开设全面质量管理培训班，介绍了7种质量管理的具体方法 ^⑤ 。
1978年8月	第一机械部	日本质量管理代表团	日本	1.参加“对日质量管理座谈”，介绍日本质量管理教育工作、质量管理月活动。2.对中国的质量管理提出建议，指出中国现在不重视质量管理，就竞争不过其他国家等 ^⑥ 。
1979年3月5日—21日	中国企业管理协会	日本生产者管理技术访华团	日本	1.考察了二十多个工厂，并与工厂管理干部、工人座谈；2.为管理工作做学术报告；3.参加由协会主持的企业管理座谈会，评估了我国企业管理的水平，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改进意见，包括应尽快实行日程作业计划、训练管理干部等 ^⑦ 。
1979年6月	中日友好协会	松下幸之助	日本	同康世恩副总理进行座谈：1.强调企业管理者要保持对事业的热情；2.要重视人才的培养；3.企业不提供财富是犯罪；4.生产力是更有价值的财富；5.增加消费是必要的等 ^⑧ 。
1979年6月12日	国家经委	日本企业管理技术访华团	日本	在京介绍了以产品质量管理及标准化为重点的企业管理经验 ^⑨ 。

① 李岚清：《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67页。

② 杨波：《开放前夕的一次重要出访》，《百年潮》2002年第2期。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0页

④ 任金生主编：《北内志》，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353页。

⑤ 马场：《日本小松制作所质量管理介绍》，《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79年第19期。

⑥ 石川馨：《石川馨谈工业生产中的质量管理》，《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79年第19期。

⑦ 《日本生产管理技术访华团对一些问题的解答和看法》，《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79年第165期；伍子杰：《中国企业家协会邀请日本生产者管理技术访华团座谈企业管理》，《经济学动态》1979年第5期。

⑧ 《松下幸之助谈企业管理》，《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0年第9期。

⑨ 中国企协20年大事记编委会编：《中国企协20年大事记（1979.1—1998.12）》，企业管理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1979年6月 12日—27日	中国企业管理 协会	日本企业管理 访华团	日本	1.参观了十个有代表性的工厂,建议我国质量管理要注重成效;2.重视质量管理教育;3.尽快建立领导全面质量管理活动的骨干队伍;4.尽快制订国家标准等 ^① 。
1979年9月	中国社科院	日本经营学者 代表团	日本	举办经营管理问题的讲座和学术报告会,建议:1.中国当务之急是改善经营管理,发挥现有设备的作用;2.推行质量管理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生搬硬套;3.要尽快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等 ^② 。
1979年9月	中国质量管理 协会	日本质量管理 代表团	日本	1.考察了14家工厂推行质量管理的状况;2.与有关人员进行座谈,就计算CP值和绘制管理图的难点谈了一些具体意见;3.在杭、沪做报告,全面介绍了企业推行TQC的方法 ^③ 。
1979年10月 13日	中国社科院	埃立克·凯恩 克劳斯	英国	在西安做了关于经济管理问题的学术报告,具体谈了工厂管理与企业管理以及企业管理与中央管理之间的关系,管理人员的训练、报酬,还有工人如何参加管理等问题 ^④ 。
1980年3月	中国企业管理 协会	美国企业管理 协会代表团	美国	进行讲学活动,主要内容包括:1.关于美国管理人员的职责问题;2.一个成功的经理人员应该具备的能力;3.关于管理人员的培养问题,认为中国企业缺乏一批精明能干的中层管理干部 ^⑤ 。
1980年9月8 日—30日	中国企业管理 协会	日本国际协力 事业团代表团	日本	参加企业管理国际讲座,主讲日本企业的生产管理、财务管理、情报管理以及职业教育等专题 ^⑥ 。
1980年8月 26日	国家经委、科 委和教育部	美国教学团	美国	与中方联合举办中国工业科技管理大连培训中心研究班,共开设会计、财务、管理经济学、信息系统等8门主修课 ^⑦ 。
1981年6月 23日—26日	中国企业管理 协会	欧洲管理论坛 代表团	西欧	与中方联合举办首届企业管理国际讨论会,就欧洲工业的特点、管理体制、欧洲企业、目标管理、技术管理、技术转让、老设备改造、工程咨询的作用和中国西欧企业合作的前景等问题做了报告 ^⑧ 。
1982年10月 19日	中国企业管理 协会	欧洲管理论坛 代表团	西欧	举办第二届企业管理国际讨论会,邀请西欧和美国、中东等16个国家和地区的50多位企业家,就技术进步与技术改造、企业家的标准、企业经营管理的标准等问题展开讨论 ^⑨ 。

从邀请单位来看,负责外国专家邀请与接待工作的主要有三个单位。首先是直接负责企业领导工作的经济管理部门,如国家经委、第一机械部等。这其中,主要是一些主管工业企业的部

① 《日本企业管理访华团对我企业管理工作的建议》,《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79年第165期。

② 《日本经营学者代表团对改进经营管理的建议》,《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79年第181期。

③ 《“日本质量管理代表团”谈我国的质量管理工作》,《经济管理》1980年第1期。

④ 埃立克·凯恩克劳斯:《谈谈经济管理问题》,《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0年第64期。

⑤ 陆铭:《美国企业管理协会主席海斯在我国讲学》,《企业管理》1980年第2期。

⑥ 兰州企业管理协会编:《企业管理国际讲座资料》,兰州企业管理协会出版,1981年,“序”。

⑦ 朱舜卿:《中国工业科技管理大连培训中心第一期结业》,《大连理工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

⑧ 薛辉:《中国西欧企业界领导人共同讨论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国际讨论会在京举行》,《企业管理》1981年第4期。

⑨ 潘承烈:《第二次企业管理国际讨论会》,《人民日报》1982年12月21日,第5版。

门,因为此时工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最多,积弊也最为严重^①。其次,是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中日友好协会等一些民间组织。这类民间组织,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对外交流活动有着独特的历史作用。由于当时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交往仍存有意识形态上的障碍,通过此类具有半官方性质的民间组织开展交流活动“常常会效果更好”^②。最后,中国社科院也发挥了重要的媒介作用,但不同于前两者更注重实践操作层面的意义,社科院更多的是一种学术思想上的交流、碰撞。这三个邀请主体涵盖了政府机构、社会组织以及科研院所等各方面,互相配合、互为补充,为引进国外管理经验发挥了重要的媒介作用。

从邀请对象来看,分别邀请了代表西方两种不同的主流管理模式的专家,即强调个人能力与个体利益,在管理手段上以财务管理为核心,强调严格遵守规则、法则和秩序,重视计算机技术等现代技术在管理上的应用的欧美专家,以及主张群体决策,强调企业要以社会与职工的集体利益为导向,重视人际组织系统的管理,注重全员质量管理的日本专家。很明显,中国的经济与管理工作者对日本的管理模式更加重视。究其原因,日本与中国同处于东方文化圈,其企业管理思想中渗透着某些中国传统文化的因素,这对我们来说有亲切感、熟悉感。而且,中国代表团在考察时也深感日本管理经验与我国经验的相似性,不仅日本在1950年代引进美国先进技术,但管理不配套的情况“同我们的情形极其相似”,他们在发展企业管理的过程中,也有“一些和我们相似的提法口号”^③。特别是日本还把中国“鞍钢宪法”中的“两参一改三结合”拿过去,提出了日本式的“三结合”,这种大胆借鉴外国经验,并结合本国国情、文化,服务于本国建设的精神为中国的领导者们留下了深刻印象^④。

从外智的主要活动与建议来看,他们介绍了本国发展与完善企业管理的历程、经验,还带来了许多先进的管理方法,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与针对性,为改善我国的企业管理工作发挥了极为实际的参考与启蒙作用。当时,袁宝华就对日本质量管理专家石川馨的意见感到惊讶,认为“我们这些多年搞经济工作的人,对提高产品质量,话说了不少,但办法不多”,日本专家的建议是切中时弊的。随即,国家经委就决定从搞“质量月”活动开始,推广全面质量管理的经验^⑤。与此同时,外国专家还直接参与到实际工作中去,为中国的企业管理状况进行现场诊断,为中方遇到的难题进行一对一的解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受此影响,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学习日本经验,开设了企业管理咨询业务,专门为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提供技术上的服务与支持^⑥。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来华专家们都是根据自身所长提出不同的政策建议,但无一例外地强调了培养管理干部、人才,以及对职工进行职业教育的重要性。这引起中共高层的重视,此后国家经委与企协就联合开展了大规模的管理干部培训和职工教育工作,其思路、内容与外国专家的建议是基本一致的。

相较于实践层面的影响,外国管理专家还推动了我国经济工作者经济理念的迭新,进而推动改革向前发展,其意义更为深远。比如,外国专家多次谈到重视市场的重要性,强调要“站在消

① 在1977年底国家计委提交的《关于经济计划的汇报要点》中就明确提到,我国工业组织和管理问题很大,工业企业不讲质量、浪费严重,影响我国经济高速度发展。政治局在讨论这个文件时,邓小平也谈到我国工业企业的设备不少,但生产效率太低,这是很大的组织管理问题。对此,徐向前就表示可以学习一下资本主义国家是怎么组织管理的,参见房维中编:《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第1分册,2004年印行,第50、59页。

② 《袁宝华回忆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51页。

③ 《日本工业企业管理考察报告》,《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79年第21期,第2、14页。

④ 《袁宝华回忆录》,第351页。

⑤ 《袁宝华回忆录》,第337页。

⑥ 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咨询部:《将企业咨询服务工作逐步开展起来》,《企业管理》1982年第6期。

费者的立场上来考虑”^①，要进行市场调查和预测工作，“市场调查对企业来说像船上的罗盘”^②一样重要。这就为市场化改革起到了理论宣传、推波助澜的效果。同时，他们还鲜明地提出中国企业“在现行企业管理体系下还谈不上真正经营管理”^③，只有使企业成为真正独立的经营单位，管理者才能灵活应对市场变化。这为当时正在进行的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指明了方向。在这一时期，不少经济学家也深受其启发，将改善企业管理的现实需要作为深化改革的原动力之一。应该说，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史的经典表述——“以开放促改革”的一个很好例证。

二、为中国经济现代化建言献策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面对经济破败的状况，中共领导层普遍急切地希望加快经济发展的速度，“把文革耽误的时间抢回来”^④，其具体体现就是又一次将“四个现代化”的旗帜高高举起。在1977年8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大上，20世纪末实现“四化”被写入党章，成为全党奋进的总任务^⑤。为了确保这一任务的如期如实完成，中国必须实现经济比原来快得多的速度发展。然而，当时人们仍受旧的那一套经济发展思想的束缚，对于新的时代条件下的经济建设工作缺乏经验，这就使得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重要性日益突显起来。对此，邓小平反复强调“关起门来”是实现不了现代化的，必须学习发达国家发展经济的经验，“学得好，就搞得快一点，也搞得好一点”^⑥，否则本世纪末实现“四化”就是一句空话。由此，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就通过各种渠道、方式邀请知名的国外经济研究专家来华座谈、讲座，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传授经验，提出宝贵建议。（见下表）

1978年至1982年外国经济研究专家访华情况

时间	邀请单位	邀请对象	国别	主要活动与建议
1979年1月27日—2月1日	国务院副总理	大来佐武郎、向坂正男、小林实	日本	与中方进行三次座谈，内容分别如下：1.介绍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经济发展资金的积累方式，建议中国增加建设资金，将直接出口原料逐步转变为原料加工产品出口，增加购买专利技术的比重；2.建议中国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不要过大规模地引进外国项目，并提出解决中国建设资金问题的五种可能办法；3.对我国的投资方向和顺序提出建议，应优先投资轻工业，控制重工业投资，建立投资的市场导向机制以及责任制等 ^⑦ 。
1979年3月	中国技术进口总公司	伊藤忠商事	日本	开设“合资企业”与“补偿贸易”专题讲座 ^⑧ 。

① 《石川馨谈工业生产中的质量管理》，《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79年第19期。

② 《日本生产管理技术访华团对一些问题的解答和看法》，《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79年第165期。

③ 《日本经营学者代表团对改进经营管理的建议》，《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79年第181期。

④ 《“文革”结束后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访袁宝华同志》，《百年潮》2002年第7期。

⑤ 参见《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七七年八月十八日通过）》，《人民日报》1977年8月24日。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编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73页。

⑦ 《日本经济学家座谈意见》，《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79年第30期。

⑧ 《合资企业和补偿贸易的讲座内容》，《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79年第193期。

1979年6月 25日—7月 14日	国务院副总理	阿尔明·古 托夫斯基	西德	参加座谈会，具体谈了中国经济建设中存在的5个问题，并提出相应建议：1.产销要直接见面；2.通过竞争促进生产；3.将人民币定价调低，鼓励出口；4.增加外债，鼓励合资经营；5.引进技术比引进设备更重要等。 ^①
1979年7月	《人民日报》 编辑部	杜亿春	新加坡	1.建议中国改变小而全、大而全的弊病，提高专业化大生产的规模与水平；2.除尖端技术与设备以外，减少对外引进的规模，重视对国外技术人才的引进；3.成立国际金融公司，吸引游资等 ^② 。
1979年9月 25日	中国社科院	都留重人、 伊东光晴、 宇泽弘文	日本	与社科院的经济学家进行座谈：1.谈到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与存在的问题；2.强调要注意投资效果的问题；3.引进技术设备必须适合中国的真实需要与客观条件等 ^③ 。
1979年10 月12日— 26日	国务院副总理	大来佐武 郎、向坂正 男、小林实	日本	举行十五次座谈会与一次报告会，主要内容包括：1.建议中国制定计划要注意综合平衡，侧重于轻工业的发展；2.建议中国要更多地利用外资，并提出要注意控制债务偿还率、借款要同国内资金结合起来使用等具体利用外资的建议；3.建议中国应采取以国内经济循环为主与有计划的国际分工为辅，计划经济为主与市场调节为辅，地方分权为主与中央集中管理为辅的经济发展模式；4.建议中国要利用银行贷款方式来代替政府去分配投资和流动资金；5.建议中国大力发展机械工业，加强工业生产能力，通过机械产品出口实现贸易顺差，解决就业问题等 ^④ 。
1979年10 月	中国社科院	陈凯颐	美国	1.讲学一周，介绍美国的成本核算 ^⑤ ；2.建议中国要改掉铁饭碗的制度，公开经济管理数据，卖给外宾的商品要适当定价等 ^⑥ 。
1979年底	国务院副总理	下河边淳	日本	1.解决人口和粮食问题是一大课题；2.工业发展要同国民的消费需要结合起来；3.要注意公共设施的建设；4.正确处理资本、技术、劳动力三者的联系 ^⑦ 。
1980年1月 7日—26日	外经部	联合国跨国 公司中心专 家团	国际	举办跨国公司问题讲习班，邀请外国专家做“外国投资与技术在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跨国公司的发展、特点和目的”“外国参加的可选形式”“工业合作”“合营企业”“合同条款的起草”“谈判程序”等9个专题报告 ^⑧ 。

① 《西德经济专家古托夫斯基教授对中国经济的看法和建议》，《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79年171期。

② 《新加坡籍华人杜亿春先生对我国经济建设的一些意见》，《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79年第182期。

③ 《中日两国经济学家座谈会记录》，《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0年第106期。

④ 《日本经济学专家大来等第二次来华座谈情况简介》，《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0年第35期。

⑤ 陈凯颐：《美国的成本核算》，《财会通讯（综合版）》1980年第S6期。

⑥ 《美籍华人学者陈凯颐的意见和建议》，《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0年第36期。

⑦ 《日本经济专家下河边淳谈的几个问题》，《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0年第63期。

⑧ 《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专家讲学记录汇编》（一）（二）（三），《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0年第65、94、95期。

1980年4月	国务院副总理	下河边淳、向坂正男、小林实	日本	1.中国近期内不要过分强调数量和增长速度;2.积累率应控制在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之间;3.搞长远规划要立足于人口与国土的状况,中长期规划以省、市、区的计划为基础;4.将农村人口分散到省能型小城市去;5.能源出口要统一“窗口”,保证数量、质量,按国际价格交易;6.开发粮食基地,由粮食进口变为出口;7.大力发展旅游与服务行业;8.大力发展机械工业;9.提高金融机构在经济中的作用;10.重视扩大就业、培养人才等 ^① 。
1980年10月至12月	中国银行	世界银行经济代表团	国际	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情况进行为期两月的考察,举行多次座谈,建议:1.中国的改革要有一个全盘的安排,不要照搬他国模式;2.必须加强计划管理工作的科学化、精细化,制定长期规划,对统计工作进行改革;3.通过提高积累率,促进生产增长的方式促进消费,而不是通过压低积累率;3.基本建设要制定长期规划、可选择的方案,加强工程设计的复审工作,引进技术设备要进行仔细选择;4.应实现粮食自给,采取有力措施节约能源;5.增加出口,改变出口结构,扩大制成品出口;6.重视教育问题等 ^② 。考察结束后,还写出一份百万字的考察报告 ^③ 。
1981年3月23日—28日	中国社科院	美国斯坦福国际咨询研究所代表团	国际	与中方联合举办国际世界经济讨论会,邀请来自亚洲、美洲、欧洲、非洲等24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学家、银行家以及企业家来华,讨论了八十年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提出建议:1.应参加“贸易和关税总协定”,减少外国对中国商品出口的关税阻力;2.应主动参加如太平洋经济协会等地区性经济合作;3.应完善合资经营的配套法律,保持政策稳定;多发展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4.要重视统计工作等 ^④ 。
1982年5月3日至12日	国务院副总理	日本经济专家代表团	日本	与中方在北京联合举办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第二次年会,就世界经济趋势、能源供求动向、企业技术改造、利用外资和保护国内产业、计划与市场调节等议题,彼此交换了看法,代表性的意见如企业技术改造最主要的是发挥企业内在的积极性;一般贸易无法引进的技术设备可以搞合资经营,除此以外合资企业不必办太多;扩大市场机制作用;更多发挥价格的调节作用;建立经济圈等 ^⑤ 。

从邀请单位来看,为中国现代化建言献策的国外经济专家主要是作为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的客人来华的。在改革开放之初,为了迅速了解外国经济发展的知识、经验,加速推进四个现代化,谷牧向邓小平提议:可否聘请几位世界名人给我们当顾问,这样可以少走弯路。邓小平随即表示赞同。此后,谷牧即以个人身份聘请国外经济专家作为经济顾问,并邀请他们来华考察,传授经验^⑥。同时,与中共领导层希望利用国外先进技术与外资帮助我们实现现代化的策略相一致,主要负责技术设备与外资引进的主管部门与机构,如外经部、技术进出口总公司等,也是邀请国外

① 《日本经济专家下河边淳、向坂正男、小林实来华座谈情况》,《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0年第137期。

② 《世界银行经济专家对我国经济问题的一些看法》,《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1年第147期。

③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世界银行对中国经济的考察报告》,《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2年第20期。

④ 温伯友:《一次成功的讨论会——杭州国际世界经济讨论会侧记》,《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1年第118期。

⑤ 《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第二次年会资料专辑》,《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2年第150期。

⑥ 《谷牧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13页。

经济专家来华传授现代化经验的主要力量。

从邀请对象来看,对国外现代化经验的学习,以日本、西德、新加坡等后发现代化国家为主,其中,日本的经验更受中共领导层的重视^①。日本为实现现代化,从统制经济、封闭型经济向市场经济、开放型经济转化,这与此时中共领导层的经济发展思路是高度契合的。而西德、新加坡的现代化历程则与中国的国情差异较大,其现代化战略借鉴价值相对日本来说要小得多,更多的是起到一种思想解放作用,比如这些地区“人口密度比中国还高,重要资源条件也不比中国好,他们能搞成现代化,我们为什么做不到?”^②

除了日本的经验被格外看重外,中共领导层还特别重视各国华人华侨与港澳同胞所提供的经验。因为他们既熟悉世界发达国家与地区的经济运行情况,又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独特国情的了解比国外专家要深刻得多,其建议往往更符合中国的客观实际。同时,他们对帮助祖国建设发展还有着极高的热情,比如美籍华人陈凯颐不仅自费到中国讲学,而且因不能领取工资而损失收入13000美元,但她表示“如果能够帮助祖国早一天,哪怕是早一小时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是我最大的满足和愉快”^③。再如新加坡籍华人杜亿春,为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曾多次自费到日本、菲律宾等国家地区搜集资料、做动员工作,不惜花费巨大。他们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应被忽视、遗忘。

从外国专家的活动与建议来看,他们从不同的专业知识、政策角度出发,主要围绕资金积累、经济结构、发展战略、国际贸易、体制改革等方面,为中国实现现代化提出具体的意见与方法,其中带有一些共性的问题:一是要筹集充足的发展资金,提高投资效率,适当控制消费,扩大利用外资的规模与途径,提高制成品出口的数量;二是要控制和缩小对外技术引进的规模,要符合中国的客观实际与现实需要,重视技术人才的引进与培养;三是要优先投资农业、轻工业,重工业要更好地为农业、轻工业服务,同时发展好交通运输业与能源行业,实现运输合理化,推动能源节约与效率利用;四是要制订长远规划,注意综合平衡,不可急躁冒进;五是要深化改革,大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扩大企业自主权,为现代化扫除机制体制的障碍。这些经验与建议,并不是要彻底改变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与规划,而是单纯地对如何更快、更有效地用较低代价实现现代化出谋划策,因而易于被中共领导层直接接纳、落实。比如,1980年4月,陈云就对日本经济专家第三次来华时提出的人口规划问题特别关注,要求姚依林在编制长期规划时要有所考虑,强调“外国的许多友好人士对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提了很多好的意见,在大的方面,许多意见是对的”^④。邓小平也认为他们提出的“几年内不要追求速度,而是集中力量打好基础”,实行“保护能源的政策”,发展水电事业等建议很不错,同样要求在编制长期规划时充分吸收进去^⑤。同年7月,国家计委向中央提交了一份《制订长远规划的一些基本设想》的汇报提纲,从其主要思路来看,与日本经济专家的建议是基本一致的^⑥。

此外,外国专家还详细介绍了合资经营、技术贸易、跨国公司、补偿贸易等国际贸易的具体方式、程序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这为我们提高对外开放的规模、水平,以及推动国际合作的规

① 谷牧率团考察西欧回国后,在向邓小平汇报时提出,相比西德,日本更具借鉴性。邓小平在访日途中亲眼目睹其现代化成就后也表示,“战后日本很快就发达起来了,这方面的经验很值得我们学习”。参见张云方:《谷牧与中日经济交流》,《百年潮》2016年第12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19页。

② 马洪:《中国式现代化与经济结构调整》,《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79年第177期。

③ 《美籍华人学者陈凯颐的意见和建议》,《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0年第36期。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57~258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57页。

⑥ 房维中编:《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第5分册,2004年印行,第75~76页。

范化、科学化起了重要作用。据当时负责引进外资工作的李岚清回忆,由于起草我国第一部外资法基本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起草组曾多次听外国专家的国际法讲座,还邀请香港的廖瑶珠大律师作为顾问,草拟关于举办合资企业的章程、合同。在起草过程中,廖瑶珠还提出只有章程、合同还不够,还应当有法源,要制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这一意见曾引起中共领导层的高度重视,对第一部合资法的落地产生了重要影响^①。

三、带来经济体制改革的新理念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不过,由于缺乏改革的指导理论与经验,全会只是确认了改革的必要性,提出了一些具体措施,并未形成改革的具体方案。对于这种认识上的困境,中国改革者的紧迫性异常强烈,希望尽快通过学习其它国家特别是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经验,为我们的改革提供借鉴。在这种背景下,大量介绍各国改革实践的书籍和资料被翻译、引介了进来,一些相关的研究成果也相继问世。但是在改革者看来,这些间接媒介的创作和翻译需要一个漫长过程,难以满足此时理论界如饥似渴的求知欲。为此,他们决定直接邀请熟悉各国改革实践以及精通改革理论的国外经济学家来华讲学,这样就既能与国外经济学家面对面交流,迅速了解各国改革的前沿信息,同时,也能让国外经济学家更加直观地了解国内改革现状,进而提出一些符合实际的建议。(见下表)

1978年至1982年国外改革经济学家访华情况

时间	邀请单位	邀请对象	国别	主要活动与建议
1979年5月 13日	中国社科院	亚历山大·诺夫	英国	先后做了四次报告,三次座谈,介绍了苏联和匈牙利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与问题,认为改革必须是整体性的,必须改变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体系,要有一定程度的市场经济 ^② 。
1979年10月 2日—22日	中国社科院	伊凡·马克西莫维奇	南斯拉夫	1.介绍了南斯拉夫的自治制度与存在的不足;2.社会主义经济也离不开竞争;3.社会主义竞争与资本主义竞争有本质的区别;4.计划与市场都是组织经济的一种手段;5.改革的步子要稳妥;6.不能照搬照抄他国改革模式;7.在改革中要注意改善人民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等 ^③ 。
1979年12月 31日—1980 年1月5日	中国社科院	W·布鲁斯	波兰	1.介绍了他提出的分权模式理论,即根据不同层次的经济活动是如何决策的,将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划分为三种不同的模式——苏联模式、匈牙利模式与南斯拉夫模式,分析了各种模式的利弊,认为匈牙利模式是最优的选择;2.经济体制改革要有政治体制改革相配合;3.宏观范围内的经济均衡环境是实行经济改革的必要条件;4.在改革方法上应采取一揽子改革的做法,不要零敲碎打 ^④ 。

① 李岚清:《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21页。

② 《英国学者诺夫谈苏联的经济改革和农业情况》,《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79年第173期;《英国学者诺夫谈匈牙利的经济改革》,《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79年第173期。

③ 赵人伟、汪丽敏:《南斯拉夫经济学家伊凡·马克西莫维奇在访华期间所谈到的一些经济理论问题》,《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0年第5期。

④ 赵人伟:《布鲁斯教授谈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0年第59期。

1979年5月 19日—21日	中国社科院	佐藤经明	日本	讲授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原因、基本特点、总课题与不足等,介绍苏联、东欧改革的过程、成就及其局限性,分析其停滞的原因等 ^① 。
1980年6月	中国社科院	赫埃尔	英国	就匈牙利的经济改革、价格制度、投资制度以及数学与计算机在经济计划中的应用问题作了四次报告 ^② 。
1980年11月	中国社科院、 南斯拉夫经济 研究会	尼古拉·乌祖 诺夫	南斯 拉夫	介绍了南斯拉夫经济体制的9个基本特点,其中比较重要的特点是实行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生产资料社会所有、企业实行自治原则、允许个体生产者私有成分的存在等 ^③ 。
1981年1月 19日	南斯拉夫经济 研究会	安东·弗拉图沙	南斯 拉夫	南斯拉夫自治制度的核心内容就是将集中于国家的权力下放给地方和各级自治机构,介绍了南斯拉夫经济中目前出现的问题与困难,以及对此采取的措施 ^④ 。
1981年3月 19日—4月8 日	中国社科院	奥塔·锡克	捷克斯 洛伐克	1.社会主义必须利用市场经济;2.主张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真正的市场机制,用指导性计划代替指令性计划;3.用宏观分配计划代替指令性计划、保证企业的独立性、引入市场机制;4.改革要有明确的目标与规划;5.调整与改革要配合进行;6.经济体制改革应以价格改革为突破口等 ^⑤ 。
1981年6月 17日—20日	中国社科院	多马	美国	1.问题不在于是否利用市场,而在于利用多少计划和利用多少市场;2.介绍西方国家的经济计划;3.计划应与投入产出表联系起来;4.社会主义国家利用市场的必要性;5.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利用市场,就会有物价上涨的风险等 ^⑥ 。
1981年11月 17日—30日	中国社科院	弗里茨·列弗 齐克	捷克斯 洛伐克	1.社会主义国家也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其根源在于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2.经济改革只有在内部经济结构和外部经济关系平衡的条件下,才适于进行;3.经济改革需要宽松、民主的政治环境等 ^⑦ 。
1982年3月 19日—4月6 日	中国社科院	尤里·考斯塔	捷克斯 洛伐克	做三场报告会,一是介绍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 不同方案,以及自己设想的以计划经济为主题的“计 划—市场模式”,二是总结东欧各国经济体制改革的 经验教训,三是讲授有关经济改革的几个理论问题; 谈了访问中国的一些体会,认为中国搞经济特区是正 确的,要坚定不移地办下去,而在计划与市场关系的 改革上,中国还没有迈出实质性步伐等 ^⑧ 。

① 毛惠良:《日本佐藤经明教授谈苏联和东欧经济改革以及经互会问题》,《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0年第107期。

② 岳群、春泽:《英国经济学家赫埃尔博士谈匈牙利经济改革问题》,《经济学动态》1980年第12期。

③ 孙家桓、郑怡:《乌祖诺夫院士谈南斯拉夫经济体制的基本特点》,《经济学动态》1981年第2期。

④ 刘国平、孙家桓:《南斯拉夫安东·弗拉图沙同志谈南经济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措施》,《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1年第40期。

⑤ 吴敬琏、荣敬本、孔丹:《奥塔·锡克论社会主义经济模式——1981年在我国访问期间的学术报告》,《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1年第73期。

⑥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多马谈计划与市场及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学动态》1981年第8期。

⑦ 陈吉元、荣敬本:《捷克经济学家列弗齐克谈苏联东欧经济问题》,《经济学动态》1982年第3期。

⑧ 尤里·考斯塔:《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问题》,《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2年第84期。

1982年7月	国家计委	世界银行经济学家考察团	以东欧经济学家为主	1.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形式方面,用指导性计划代替指令性计划;2.在农村改革方面,利用各种形式的经济杠杆推动农业计划管理体制更加灵活,运用经济手段引导社队企业发展;3.在就业方面,通过一定的经济手段缓和就业,如支持发展小集体与私人企业;4.在价格改革方面,可采取“解冻”价格、国家定价、影子价格三类价格的过渡方式;5.中国的经济改革不能停滞,必须继续前进;6.改革应该渐进进行;7.要重视苏东改革的反面经验等 ^① 。
---------	------	-------------	-----------	---

从邀请单位来看,邀请与接待国外改革经济学家的工作主要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特别是该院的经济研究所牵头。所里的主要经济理论工作者孙冶方、许涤新、董辅初、刘国光等都曾在苏联留学,有国际交往的经历与经验,很多外国专家都是他们在对外学术交流的过程中邀请来的。如马克西莫维奇就是在接待孙冶方等人率领的中国赴南斯拉夫考察团时确定了访华行程,布鲁斯是董辅初在牛津大学访学时邀请来华的,世界银行经济学家考察团则是刘国光委托世界银行中国处的首席经济学家林重庚组织起来的。

从邀请对象来看,主要是邀请来自东欧的改革经济学家,或一些熟悉东欧改革实践与理论,具有一定东欧改革知识背景的西方经济学家。这表明,在改革之初,中共领导层选择东欧作为改革借鉴的首要对象,而其原因有以下几点:(1)对东欧国家的初步考察为改革带来了重要的认识启蒙,使人们“在思想上更加确定了社会主义模式的多样性”^②;(2)同属于社会主义制度,且都曾在一段时期内沿袭过苏联的经济体制,大家普遍感到东欧国家的改革经验很值得借鉴^③;(3)东欧各国的改革起步较早,积累了一定的改革经验,而东欧的改革经济学家,如奥塔·锡克,曾参与并领导过改革的实际工作,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4)在借鉴西方经验时总感到放不开手脚,相反,“借鉴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发展经验教训就没有这种制度上的障碍”^④;(5)此时“中国的决策者和多数经济工作者都还没有跳出计划经济的大框框,而是想在计划经济中增加市场机制的作用”,这与东欧各国的改革思路是基本一致的。基于以上因素的考量,中共领导层非常重视东欧经济学家的意见与建议,要求将他们的报告以简报的形式递送中央,并多次指示国内的经济工作者与他们进行座谈,在改革学习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从外国专家的活动与建议来看,对外国改革经验的学习大体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实践经验的学习,了解国外改革的具体过程、举措与政策法规,关注国外改革的成就,为国内改革寻找合法性依据,特别是重视改革中存在的问题、不足,并以此为镜鉴;二是理论方法的学习,搞明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基本问题,熟悉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不同目标模式,理清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及其结合方式,并与改革实践相结合,为改革提供方法论意义上的指导。通过这两方面的学习,中国的经济工作者认识到中国经济体制的弊病不在于政策失误,而是这套体制本身存在着固有的、不可避免的问题,只有通过根本的经济体制改革才能加以解决。更重要的是,详尽了解东欧改革经验后,中国经济工作者也加剧了对在中国使用东欧经济改革模式的悲观心理,通过剖析东欧改革中存在的弊病,以及对中国特色国情的认识加深,为之后中国改革实现对东欧各国的超越

^① 任涛:《从东欧经验看中国的经济改革》,《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3年第77期。

^② 于光远:《背景与论题:对改革开放初期若干经济理论问题讨论的回顾》,《经济科学》2008年第6期。

^③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编:《邓小平与改革开放的起步》,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231~234页。

^④ 萧冬连:《中国改革初期对国外经验的系统考察和借鉴》,《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4期。

奠定了思想基础^①。

需要指出的是，从外国专家带来不同改革经验的先后顺序来看，我们对东欧经验的关注在不同时期是有侧重与偏好的，而这也与中共领导层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认识密切相关。改革动议之初，中央希望在整个经济体制上有所突破，所以比较倾向于在体制变迁上迈出较大步伐的南斯拉夫模式，在理论上则重视主张自治理论的马克西莫维奇。随着南斯拉夫的经济出现严重危机，而我们又开始进行国民经济调整，确定了改革要服从调整的方针，中央又更倾向于强调稳健平衡，但在市场化改革上有所突破的匈牙利模式，在理论上关注强调计划与市场合理结合的布鲁斯与奥塔·锡克。之后，当计划经济主体论再次成为改革的基本原则，仍坚持计划经济方向的苏联改良模式反而受到重视，而坚持计划经济为主的考斯塔此时也备受青睐。可见，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借鉴外国改革经验并不是漫无目的、没有计划性的，而是有着强烈的实践导向，能够根据改革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现实需要而有针对性地进行学习。

一种笼统的说法认为，中国在经济改革之初是“摸着石头过河”，改革的领导者没有进行过多的顶层设计，只是跟随实践形势的变化发展作出相应的政策安排而已。但通过梳理国外改革经济学家访华的历史过程，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经济改革，特别是城市改革从一开始就在思考最优解的问题。改革者们希望通过比照其他国家的经验与教训，为中国找到一条代价较小、受益较大的符合我国国情的改革路径。事实上，许多政策措施，如厂长负责制、价格双轨制、宏观经济调控等，并不是改革实践直接产生的产物，而是在充分吸收国外改革经验，并与中国的特殊国情相结合的基础上，经过深思熟虑的设计后才提出并推行的。

四、传授现代经济理论与方法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经济理论界对“四人帮”歪曲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问题进行了拨乱反正，逐渐回到了以生产力为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正确轨道上来。但是，面对当时日益频繁的国际交流，特别是与西方国家恢复外交关系后不断增加的经济合作，中国的经济理论工作者越发意识到这套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有些难以应对新形势的需要，感到了解与学习西方的现代经济学很有必要。对此，姚依林曾在国务院务虚会上引用列宁讲的“在狼群中要学会狼叫”这句话，强调“既然不得不与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就要懂得它们的那一套”^②。在此种思路的推动下，1979年1月，在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编辑部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经济理论工作者们就提出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客观实际”，并列举了15个值得借鉴的理论^③。由此，中国经济理论界开启了系统学习现代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的历史进程，而西方经济学家来华传道授业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见下表）

① 林重庆等：《亲历中国经济思想的对外开放》，《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4期。

② 于光远：《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70页。

③ 杨德明：《关于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评价问题》，《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79年第122期。

1978年至1982年西方经济学家来华授课情况

时间	邀请单位	邀请对象	国别	讲学内容
1979年9月 20日	上海社科院	都留重人、宇 泽弘文	日本	1.日本经济学界的研究现状;2.日本经济学的发展历程;3.经济计量学与凯恩斯主义存在的问题等 ^① 。
1979年10月	中国社科院	美国经济学家 访华代表团	美国	1.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有关问题;2.实际收入和生产额的国际比较问题;3.增长计算法的用途;4.比较结构的数量分析;5.美国当前的经济学派等 ^② 。
1979年10月 26日	上海社科院	肯尼斯·阿罗	美国	介绍了不确定性经济学的基本内容、原则等 ^③ 。
1980年6月 24日—8月 11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	美国经济学家 代表团	美国	举办为期7周的“经济计量学讲习班”,授课内容包括:1.经济计量学的范围与方法;2.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基本内容;3.动态经济系统分析与控制;4.系统需求、生产与成本系统、消费需求函数、消费行为和效用函数;5.多重共线性、经济增长理论、时滞分布、统计决策和多种运筹学方法;6.制订经济计量模型中容易碰到的问题及处理方法;7.经济计量学的立论基础、利用财政和货币政策控制经济的发展、沃顿模型与联结模拟技术等 ^④ 。
1981年3月 11日	中国社科院	荣朴石	美国	介绍了比较经济体制学的基本性质、主要内容等 ^⑤ 。
1981年7月 22日至8月 28日	中国社科院	美国发展经济 学家代表团	美国	举办“发展经济学讲习班”,授课内容包括:1.发展经济学的概况,劳动力市场的经济学,成本收益分析和评价方案;2.1949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农业增长的计算;3.农业加速发展的战略,农业研究政策;4.劳动过剩经济的发展模式;5.发展的计划问题,社会核算矩阵等。
1981年9月 16日	上海社科院	哈里斯	英国	介绍“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的主要内容与实施方法 ^⑥ 。
1982年9月 17日	中国社科院	沃尔夫	美国	1.政策分析的一般步骤、特征;2.政策研究机构及其与政府的关系;3.政策研究机构的管理等 ^⑦ 。
1982年10月	上海社科院	斯科尔卡	奥地利	介绍投入产出模型的主要类型、优点与作用,运用投入产出模型计算价格的步骤与注意事项,以及如何将投入产出模型适用于价格改革等 ^⑧ 。

从邀请单位来看,主要由中国社科院的世界经济研究所负责邀请与接待西方经济学家。在1979年1月6日,胡乔木就在中国社科院全院大会上明确提出了1979年要扩大同国外社会科学工作者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的任务^⑨。而经济学科与外界隔绝的时间最长、程度最深,并与世界先

① 《日本著名经济学家都留重人等在上海读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一些问题》,《经济学动态》1979年第12期。

② 张守一:《美国经济学家访华代表团的学术报告》,《经济学动态》1980年第1期。

③ 肯尼斯·阿罗:《不确定性经济学》,《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1年第95期。

④ 张守一、周豹荣:《经济计量学讲习班综述》,《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1期。

⑤ 荣朴石:《比较经济体制学简介》,《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1年第95期。

⑥ 许滢:《英国经济学家哈里斯在沪谈西方解救经济危机的理论与方法》,《经济学动态》1982年第1期。

⑦ 毛立本:《美国学者沃尔夫谈政策分析》,《经济学动态》1983年第3期。

⑧ 钱志祥、汪子青:《用投入产出模型计算人为价格——奥地利比较经济研究员斯科尔卡的访沪报告》,《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3年第185期。

⑨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史研究室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编年简史(1977—200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641页。

进的学术水平差距最大，是对外学术交流中的重中之重。据统计，仅1979年社科院接待来华学者总数达63起、303人次，比1978年增长一倍多，其中经济学科就达31起、163人次，占一半之多^①。另外，上海社科院由于素有国际交流的地缘优势，在邀请西方经济学家来华讲学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邀请对象来看，主要以西方经济学比较发达的美国作为学习对象。在二战以后，西方经济学的中心由英国转向美国，形成了以“新古典综和派”为代表的美国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主流派，为美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其它西方国家走出战争阴霾，实现经济恢复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指导。实际上，日本、东欧的现代经济学观念、理论与方法也多是从小美国引进并实现本土化的，在与日本经济学家与东欧经济学家的学术交流过程中，他们也都在曾谈到向美国学习现代经济学的问题，比如都留重人在介绍日本经济学界的情况时称，“日本经济学的动态，实际上反映了美国经济学的动态”，而匈牙利经济学家在与中国考察团座谈时也坦率表示，在设计改革方案时曾借鉴过六七十年代在美国经济学界风靡一时的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②。

从讲学内容来看，外国专家主要介绍了西方的经济计量学、比较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的知识与方法。之所以选择这些理论作为最初的学习对象，一方面是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量，此类理论主要是以提供经济计算模型为重点的技术型经济理论，或者是以落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为研究对象的策略性经济理论，较少涉及到自由市场、私有制等带有意识形态因素的问题，这在改革之初人们思想还未完全解放的氛围下是易被接受的。另一方面，是由于彼时经济工作的现实需要，此时人们急于为改善我国经济工作中存在的计划制订太过粗糙，统计工作跟不上等不足寻找方法，急于为我国正在起步的经济体制改革提供广袤的国际视野，并急于为我们这样“人口多、底子薄”的发展中国家寻求经济快速发展的思路，而这些理论恰好满足以上需要。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本文所提到的外国经济专家来华的目的各不相同，针对的问题，给出的建议也不尽相同，但他们在充当智库的过程中都会或多或少地涉及、运用到现代经济学理论，为中国的经济工作者带来新的认识与方法。比如，布鲁斯在为我国经济改革提出建议时，曾运用“买方市场”的现代经济学理论去解释中国当下放慢改革步伐的合理性，说服了不少在场的经济界人士^③。“买方市场”这一概念一直被中国经济工作者们沿用到1980年代中期。再如，世界银行经济专家向我们提交的考察报告中大量运用了现代经济学的概念与方法，其中既有基本的经济学概念，又有计量经济学、经济模型这样复杂的分析工具，这让中国的经济工作者更加坚信现代经济学是适用于中国的^④。

余 论

改革开放之初，通过邀请外国专家来华讲学座谈，带来了不同类型国家和地区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经验与教训，通过与中国特殊国情、历史经验的比照、思考，对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建设道路的认识更加全面深刻，为中共高层与中国经济工作者在各国现代化建设的一般规律以及发展战

① 《社会科学院去年对外学术交流空前活跃》，《经济学动态》1980年第6期。

② 参见《日本著名经济学家都留重人等在上海谈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一些问题》，《经济学动态》1979年第12期；于光远：《关于在我国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建议》，《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0年第68期。

③ 这是吴敬琏在1986年国家经委第二十三期经济管理研究班上的回忆，参见国家经委经济干部培训中心编：《宏观控制与搞活企业》，企业管理出版社1987年版，第14页。

④ 林重庆：《亲历中国经济思想的对外开放》，《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4期。

略的基础上,提炼升华出一套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范式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邀请外国专家来华是一个有组织、有规划的系统工程,通过梳理不同时期、阶段外智参与的侧重点、特点以及形式机制的变化,可以很好地反映出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思路在不断走向深化。从起初主要邀请精通西方现代化的企业管理,以及熟悉西方国家现代化历程与战略的外国经济与管理专家,到后来重点转向邀请掌握不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经验与理论的经济改革专家,表明中国的经济工作者改变了以为只要改善经济管理,调整经济结构,引进外资和技术就可以实现现代化的简单思路,逐渐意识到改革是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从开始比较重视来自社会主义阵营的外国专家,到后来更关注精通现代经济理论的西方经济学家,意味着人们的思想开始突破意识形态的藩篱,现代化建设在思想理论指导上正与世界先进水平接轨。此外,从邀请外国专家的规模与形式来看,邀请人数不仅逐年增多,还形成了一些比较固定的长期交流机制,这说明中国利用外国先进经验来帮助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思路是越来越坚定的。

邀请外国专家来华的历史过程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以我为主、兼容并包的特点。“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重启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并没有和过去一样单一地模仿苏联的经验,而是充分吸收一切世界文明优秀成果,邀请不同国家与领域的专家来华讲学。他们的意见有时与我们是互补的,有时又是对立的,对此我们既尊重不同意见,又进行详细地比较,并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选择出符合我们需要的意见与建议。如世界银行经济学家考察团认为中国不应该缩小积累率,国际世界经济讨论会上的专家也对中国控制通货膨胀感到不理解,实际上,这些政策举措恰恰是我们自己总结几十年来建设社会主义经验教训的结果,在行政式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高投资率、高膨胀率所带来的消极影响远远高于其带来的效益,中国经济工作者对这些问题的认识要比国外专家深刻得多。对于改革的路径选择,我们也没有照搬外国专家提出的“一揽子”改革建议,而是采取“渐进式”的改革,将改革的程度限定在社会的承受度范围内,这后来也成为国内外学界公认的中国改革成功的重要经验之一。应该说,正是由于我们在经济改革和发展中没有照搬外国的某一种理论和外国的某一种经验,而是根据自己的情况,综合各种理论和各种经验教训,创造性地去探索,才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本文作者 中国人民大学党史党建研究院中共党史专业博士生 北京 100872)

[责任编辑:凌承纬]